

有限性与延展性：新中国 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 *

祁昊天 赵书韞

【内容提要】 文章从国家安全本体论、安全体系认识论与安全实践方法论三个维度考察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时间分段，讨论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有限性与延展性是这一演进过程中安全思想的连贯体现，分别涵盖了安全目标、认知与方法在各阶段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特征。虽然新中国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安全环境和安全需求，安全形势愈加复杂，但是安全思想和实践总体符合安全有限、延展演进的特征。安全具有弹性但不可过载，不存在绝对安全的空间，而狭义的、单一领域或维度的安全亦无法有效支撑对国家安全的维护，特别是在愈加复杂和不确定的国家安全环境中更是如此。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有限—延展”的演进特征反映了安全环境的客观变化与领导人主观能动的决策部署。

【关键词】 国家安全思想；演进；有限性；延展性

【作者简介】 祁昊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助理教授；赵书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871）。

【DOI】 10.14093/j.cnki.cn10-1132/d.2025.01.00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4X（2025）01-0073-23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重点国家的安全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24&ZD29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文责自负。

一 导言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面临过多次重大国家安全挑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不断战胜困难，优化和改善国家安全的状态与趋势。这与国家安全思想的指导与支撑密不可分。对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进行完整梳理将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本文仅从规律探索的角度对过去七十余年中国国家安全思想演进中相对稳定的主线特征进行梳理，主要探讨以下问题：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在长周期、环境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演进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安全目标、安全认知和安全方法等维度有何继承与发展？

本文发现，虽然中国国家安全的环境、内容和重心均出现过重大变化，但在思想层面对国家安全的总体要求是相对稳定的，表现出有限性与延展性的特征，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国家安全思想层面的体现。从 1949 年到 1978 年，新中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多重安全威胁，包括国共内战的余波、朝鲜战争的爆发、中苏关系的紧张、国内形势的多次变化以及全球和周边国家的复杂局势。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高度集中的安全政策和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对抗性冲突与革命成为该时期的主要特征。国家安全思想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对政治、军事等少数领域的资源倾斜和目标聚焦，而延展性则体现在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全面认识和防范。

从 1978 年到 2012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更加注重经济建设和国际环境的和平稳定。安全思想的领域逐渐扩展，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安全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和信息等领域。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也更为广泛，除了国内和周边安全，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社会结构变化造成的稳定问题以及伴随对外开放而来的外部风险均更加普遍和突出。这一时期，安全的有限性体现在更加强调相对安全，重视和依靠发展；而延展性则更为凸显，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受到更多关注，国家对各种新兴安全威胁的重视程度和防范能力亦逐步提升，国家安全思想向多元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

2012 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思想也更为成熟和系统。“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造性提出突破了传统上相对狭义的国家安全观，扩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并表现出在安全本体、安全认知和维护安全方法等层面的系统化特征。在新时代，安全的有限性表现为安全环境复杂化前提下安全和治

理资源的静态稀缺性,以及国家对相对安全和关键安全领域的重视。延展性则体现为对国家安全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的深入认知与综合应对。

总之,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是一个不断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逐步丰富和完善的过程。有限性与延展性的国家安全思想体现了新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应对多样化安全挑战的智慧。从国内到国际,从传统到非传统,中国形成了一种动态、开放的国家安全时空。但同时,安全环境的时空复杂性也意味着过度的安全化会造成更大的附带风险叠加,安全不可过载。后文将对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演进的文献进行回顾,继而阐发本节所介绍的“有限—延展”视角。通过对三个历史时段的详细回溯,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对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进行分析。

二 文献与分析框架

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在国家安全本体论、安全体系认识论与安全实践方法论三个维度上均经历了系统性的演进,其背后是时代特征的适应要求、国际环境外在压力、国内需求定位以及领导人认知与方略定位的综合影响。不少学者已通过历史文献和学理研讨,对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特征和内容进行了梳理和诠释,本文尝试对聚焦国家安全思想诠释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从中梳理既有诠释体系和待解决的问题,继而通过回归一手资料进一步厘清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脉络。

第一类诠释文献聚焦于具体历史阶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国家安全思想,对其进行单阶段的思想概述,或是具体时段中特定安全领域的思想梳理。这类文献对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具体发展阶段和突出成果进行总结,基本完成了描述和刻画具体阶段特征和重心的任务,为理解国家安全思想演进发展中的具体表现提供了基础。^①在其基础上,相关梳理与诠释工作的进一步任务是对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长周期演进的规律探索和系统讨论。

^① 杨云霞、石映昕:《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四维论析》,《毛泽东研究》2023年第3期;蔡芳、李婧:《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时代境遇、核心要义及其现实启示》,《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年第13期;张云:《论江泽民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第7期;张安、卢建军:《胡锦涛国家文化安全思想探析》,《理论建设》2014年第3期;林建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时代意蕴和旨归》,《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马振超:《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指导思想》,《行政论坛》2018年第4期;袁鹏:《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7期;杨海:《习近平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思想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第二类诠释文献多为纵向、整体性的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研究，为长周期的思想梳理提供了阐释方案。这类文献通常将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与实践的演变概括为从“政权一备战一建设”到“和平一稳定一发展”的转向，更加侧重对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七十余年演变历程进行系统的全景呈现，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刻画为一种具有线性特征的演进过程。^①

第三类文献从国家安全学建设的角度，侧重国家安全理论建构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讨论。它们的主要方向不是对思想本身的梳理或诠释，而是基于回顾和分析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渊源与特征、安全环境与条件的影响、安全实践的背景与要求，对如何吸收安全思想的成果和学科体系构建需求进行延伸思考。^②这类文献丰富了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研究视角和应用启示，是对安全思想与实践之间进行关联的重要拓展。

既有研究为我们认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演变提供了探索的基础，同时也留下了待解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在其演进过程中是否形成了某种连贯特征？对此问题的探索有助于串联和扩展第一类文献中的阶段性分析，丰富和深化第二类文献中的历时性诠释，并接续第三类文献从安全理论与学科建设的关切角度，对思想和实践的关联进行深入探讨。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在单向度的线性历史诠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对统一特征进行梳理与分析，并希望从中获得理论启发和实践指导。基于历史文献梳理和三个维度有机结合的视角，本文认为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在演进过程中始终强调安全的“有限一延展”性。在有限性方面，笔者纳入时空条件的静态和动态维度，静态维度关注国家安全本体和目标，安全认知或安全方法受一定时代特征和安全环境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动态维度则探索安

① 余潇枫、章雅荻：《广义安全论视域下国家安全学“再定位”》，《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凌胜利、杨帆：《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6期；肖晞、王一民：《中国共产党百年国家安全思想发展析论》，《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1期；董春岭：《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张琳、赵佳伟：《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百年演进与现实启示》，《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2期。

② 冯维江、张宇燕：《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李文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2期；唐士其、于铁军、祁昊天：《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白云真：《中国国家安全基础研究路径、进展与未来》，《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6期；祁昊天：《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建设思考》，《大学与学科》2023年第1期。

全思想内容在时空变迁中是否倾向相对均衡、聚焦和连续（参见表 1）。有限性的思想特征表明，新中国国家安全目标、关切与资源演进均存在一定的界限和相对延续，体现了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在不同时空条件、安全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影响下的现实根基与主体脉络。

表 1 有限性的思想维度及特征

	静态	动态
本体论	时空条件影响安全本体和目标	时空条件变化时，追求安全状态和目标调整的相对均衡
认识论	时空条件影响安全认知思想框架、意识形态与信息支持等方面的丰沛程度	时空条件变化时，安全认知和关切保持聚焦
方法论	时空条件影响目标与方法的匹配程度、政策工具、能力的充沛程度	时空条件变化时，应对安全威胁和风险及塑造安全态势的方法稳健、连续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与有限性的思想维度及特征相对应，延展性具体表现为国家安全思想在横向视角下安全内容的丰富以及纵向视角下的动态适应与灵活调整（参见表 2）。值得注意的是，延展性并非无限扩大安全的范畴，走向“一切皆可安全”的“泛安全化”，而是在安全领域和边界内对安全目标、认知与方法进行深化、丰富，从而“填补真空”，实现安全思想体系的动态发展。安全思想的延展性特征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客观安全环境的全面视野与深入理解，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有限安全资源的有效调配，是安全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呈现。

表 2 延展性的思想维度及特征

	横向	纵向
本体论	安全本体和目标存在领域间关联	安全本体和目标的变化与优化
认识论	安全认知和判断的全面	安全认知和判断的灵活、深入
方法论	安全路径与手段多元	安全路径与手段的发展与统筹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有限性与延展性不是相互冲突的单一属性，而是国家安全思想在诸多领域和不同维度的多个特征集合。这对属性之间既存在关联，又具有张力：一方面，有限性

有限性与延展性：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

与延展性内涵不同，侧重各异甚至相斥；另一方面，二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渗透。有限性更多地体现了安全思想的“收”，延展性则代表了安全思想的“放”。收放之间，既有相对侧重，却也彼此影响、辩证统一。有限的特征下，包含了时空变换的相对安全动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而延展特征也存在其限度，并不是突破安全边界、模糊安全概念、追求无节制扩张的“绝对安全”。两者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安全思想研究的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统一，勾勒出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在长周期和复杂环境中收放有法、动态演进和优化的发展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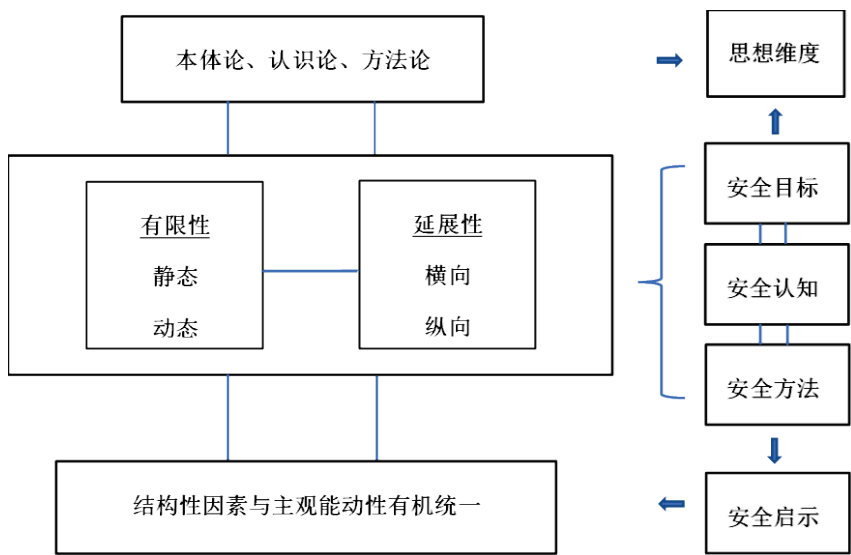


图1 安全思想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通过有限性与延展性的分析框架，本文将讨论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重维度上的具体表现，以及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动态变化。总体观之，在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与实践中，安全始终都是国家方略的一个普遍性维度，而非单纯作为国家战略与政策的其中一个领域。在不同时空下，新中国国家安全均面临安全环境与安全需求的复杂挑战。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集中高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多元综合，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方位统筹，都体现出“有限—延展”的总体特征，也蕴含着新中国安全思想演进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安全不限一隅，但安全不可过载。

后文将对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段国家安全思想在三论维度上的演进进行分析,并依据分析框架进行特征定位和总结。以重要历史事件和领导人任期等依据为分界,本文将回顾阶段划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 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年至今),从中梳理国家安全思想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不同维度的丰富与衍变,以及其稳定延续的特征与逻辑。

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安全(1949—1978 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国家安全思想从国内外整体安全形势出发,其核心安全目标在于维护主权独立与政权安全。复杂且严峻的安全环境,加之相对匮乏的战略资源,使得中国在这一时期广泛采用革命性与战斗性的手段,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建设与巩固。

(一) 本体论:政权稳定与主权安全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国内外安全环境非常严峻。在国内层面,存在国民党残余、匪患、分裂势力等扰乱因素,时刻威胁着新中国政权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稳定。在国际环境层面,美苏冷战对峙形势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和封锁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基于现实的安全威胁和战略考量,中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革命的思想,把捍卫新生政权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任务,重视维护政权稳定与主权安全,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①

在政治安全方面,新政权对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不法投机资本,建立国营经济 and 新的经济秩序,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条战线取得较大成果,有效维护了政权稳定。^②同时,围绕领土主权问题,党中央部署了解放海南岛和东南沿海岛屿的战役;粉碎了“西藏独立”的分裂阴谋,使西藏地区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侵害。^③针对台湾等因历史遗留问题尚待解放的地区,

① 董春岭:《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3 期,第 6 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59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37、41-44 页。

有限性与延展性：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

毛泽东明确声明，收复台、澎、金、马，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外人无权过问”。^① 在国防安全领域，军队保家卫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职能非常突出，发展和加强军队力量成为重中之重。^②

这一时期，新中国的核心安全目标体现了安全思想的有限性。受严峻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影响，维护主权和政权安全是该时期国家安全的头等事项和长期任务，也是资源倾斜的重点领域。同时，该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不仅受到时空条件对有限性的影响，还体现了决策者能动适应带来的延展性。为适应国内外大安全环境，新中国逐步实现了政权和主权安全在全民范围内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与内化（internalization）。对传统安全的强调影响了整体国民经济、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大众心理的发展，推动了追求自立自强的国家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

在此期间，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同样服务于国家安全与战略全局，并在国际形势变化中不断调整和优化战略目标和方法。为维护独立、反对外来侵略，新中国建政初期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联苏反美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冲破国际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争取国际社会对新生政权的承认。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格局变局再起，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苏攻美守的全球态势突出，苏联对中国的直接安全威胁更加显著。根据新的安全形势，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对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改善中国国际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同美国、日本和诸多欧洲国家关系也逐渐实现正常化，基本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用外交发展维护了国家安全利益。

该时期，中国始终将安全目标的重心置于国家主权和政权安全事宜上，坚定维护自身和周边安全，追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虽然受到国家实力的限制和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只能侧重以军事和政治为代表的传统安全，但在具体安全实践中，新中国在可能范围内成功地进行了重要且有效的战略调整和优化，展现了其安全目标和实践联动的延展性。

（二）认识论：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内外塑造

1949 年以后，中国的国家建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展开，相关工作与国家安全关切高度重叠。其中，意识形态工作既在国家安全面向中发挥统领性作用，又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进程高度融合，整体呈现出安全有限和延展的双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3-387 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3-104、381、390 页。

重特征。其中,有限性表现在突出意识形态棱镜对国家建构和国家安全的认知塑造和统领作用;延展性则体现为意识形态认知同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多领域建设的融合,体现了全面和灵活的特征。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期间,党和政府积极开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是建立意识形态工作体系和宣传机构,把宣传思想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建立传播革命思想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舆论阵地。1951 年 5 月和 1954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要求“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从适应新民主主义纲领方针的宣传,转向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①

二是在党内外进行思想文化教育,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区分敌我矛盾,形成既有自由民主,又有统一意志的局面。这一对内宣传工作同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产生了有效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敌对势力有计划、有组织地炮制大量谣言,其内容从恐吓人民群众、歪曲政府政策到挑拨干群关系不等,试图威胁新政权稳定。^②党从理论教育、思想批判和组织领导等方面开启了意识形态建设,有效维护了主权与政权安全。

三是立足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历程中开展长期的、坚定的思想斗争,让思想建设适应和促进制度建设。毛泽东指出,通过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然而在重要的政治和思想战线,并没有彻底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争端,“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③20 世纪 50 年代,党在思想文艺领域开展了多次思想批判运动,并持续调整、完善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追求与工作方式。在外交领域则坚定社会主义阵营定位,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声援和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呈现出有限和延展的特点,这一特征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相辅相成,展现了以意识形态统筹全局的安全观和治理观。然而忽

① 韩晓青:《新中国成立初期召开的两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学习时报》2022 年 12 月 2 日,第 A5 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6—149 页。

② 黎砂:《粉碎反革命谣言》,《人民日报》1950 年 10 月 17 日,第 1 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1 页。

视其他前提性条件，过于依赖从意识形态维度出发的基本认知，以此作为引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也带来了方向上的谬误。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党在指导思想和国内外形势研判中的“左”倾错误愈发严重，造成意识形态泛化。^① 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1963—1965 年的“四清”运动，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愈发偏离正轨的斗争和过火批判，均反映出人们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知局限。^② “左”倾错误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思想文化领域蔓延开来，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

（三）方法论：斗争与革命的指导

围绕主权与政权安全的目标，以及重视意识形态统领制度建设的安全认知，新中国广泛采用了斗争与革命的指导理念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维护政权安全和社会安定，党和政府先是迅速肃清残余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打击企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动，提出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的方针，施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进入 50 年代，各地匪患已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基本稳定。针对潜伏各地的反革命分子及其暗害行动，党中央确定了党委领导、全党动员、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的镇反路线，强调要统一计划和行动，注重不同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宣传，破除神秘，审慎行事；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毛泽东还提出“稳、准、狠”的镇反工作方针。面对建国初期危害政治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必须采取大范围的、较为强硬的军事手段，集中力量，调动资源，进行歼灭或打击。

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思想文化战线上，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也在推进。全国各地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政府，改造城乡基层政权，开展民主建政活动；在新解放地区打击不法投资资本，建立、维护社会秩序与经济生产。^③ 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对外宣传“中苏友谊牢不可破”和“联苏抗美”，贯彻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的精神。例如朝鲜战争中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向世界传达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

① 伍志燕：《建国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理论学刊》2017 年第 3 期。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10-714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7-59 页。

在思想上,与资产阶级等敌人进行坚定的意识形态斗争,善做政治工作,紧密联系群众,推进意识形态机制构建和宣传教育。1949—1953 年,党和政府对内歼敌镇反、推进社会改革,对外进行抗美援朝,坚定地捍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制度建设奠定基础。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各领域的斗争举措很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进一步凸显了该时期国家安全在方法论层面的有限性特征:面对严峻的安全环境和匮乏的安全资源,新生政权必须对内掌握武装力量,维护社会秩序;对外明确立场,进行外交斗争,从而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

在延展性方面,虽然该时期总体上采用明确敌我的革命与斗争方法,但同样重视斗争的适用性与技巧性。党和政府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的政治实践和社情国情相结合,将斗争理念与立足全局的政权安全、制度建设相结合,共同嵌入国家治理和运行的途径和机制中。例如,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克服官僚主义的不良风气;同时也强调明确斗争对象,善于团结群众,从而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经济生产。

尽管革命与斗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一时期也存在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误判,以及对革命和斗争方法的扩大化、教条化应用。由于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可能爆发,一些大政方针分散了经济建设中宝贵的人力、物力。国内“左”倾运动的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民主、法治和经济建设受挫,也干扰了正常的外交工作。对外推进“世界革命”“革命外交”,造成了一定的外交纠纷和政治误解,中断了同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这一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方法层面未能够在有限性与延展性之间实现较为合理的平衡,安全实践出现波折。尽管党中央在此过程中也有在外交等领域纠正和整顿“左”倾错误,但总体上缺乏多元、科学、稳定的安全方法,在塑造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内外环境方面遇到了挫折。

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安全 (1978—2012 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在强调主权和政权安全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发展安全。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国家安全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江泽民针对复杂多变的地区环境,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胡锦涛强调用更广阔视野审视国家安全问题,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

有限性与延展性：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

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① 这一阶段，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有限性与延展性日益凸显，对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安全相对性更加重视，安全内涵也日益丰富，既延续传统安全关切，又兼顾非传统安全。在安全认知层面，既有底线思维，又有辩证创新，强调对整体趋势和局部态势的综合认知。在安全方法上相对倚重发展，探索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并行的安全路径。然而，该时期多元综合的安全需求，同有限的安全方法、资源之间的张力依旧存在。

（一）本体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动态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美苏关系开始缓和到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异常复杂，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亦面临诸多复杂的安全考验。在此期间，国家安全思想本体层面的有限性与延展性发展得更为充分和平衡。

首先，国家主权和政权安全仍是最重要的安全事项，体现出国家安全思想稳定、聚焦和延续的有限性特征。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安全思想，对内维护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有机统一，对外不屈从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武装挑衅和制裁干涉的进犯。^② 邓小平一直强调国内环境的稳定对国际局势的重要影响。^③ 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认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④ 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江泽民提出新安全观，并强调尽管“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但“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坚定不移。^⑤ 胡锦涛坚定“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启动对台立法，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⑥ 打击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这些都是新中国主权和政权安全一脉相承的表现。尽管冷战结束后，时代主题出现变迁，但安全目标的演变并非随时空条件转变而彻底变化，其调整以相对均衡为目标。

① 中共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32 页。

② 张幼明主编：《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83-84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4、361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 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9、296 页。

⑥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4 页；《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50-255 页。

其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结合得到进一步深化,不同领域关联紧密,安全延展性更为鲜明。国家安全思想逐步重视防范国际国内因素交互作用产生的新安全威胁,既注重上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又重视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兴安全风险。例如,中共十六大报告既强调军事国防,又明确提出“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①丰富了国家安全构成。该阶段,国家安全思想强调重视各领域、各类型的安全风险,一方面是认识到国际环境中安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可预见和难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各种问题的可能性切实存在。另一方面是指明这些安全问题的多元性、广泛性和普遍性,不仅包含传统安全议题,例如影响中国安全的局部军事冲突、国内政治安全挑战,还有严重传染性疾病、重大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恐怖主义活动等非传统安全的风险。^②

最后,相对安全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普遍性意味着绝对安全的目标难以企及,推动了对相对安全和风险防范的理论与实践探索。2001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首倡以相互信任、裁军和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③其后的《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文件指出,新安全观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④这反映出安全目标从绝对安全到相对安全的优化调整,是安全思想“有限—延展”的动态呈现。

(二) 认识论: 整体趋势与局部态势的辩证关系

这一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延展性表现得非常显著。在对内拨乱反正、对外增进交往的过程中,党和政府调整了“世界战争迫在眉睫”的总体安全认知,将和平与发展的积极要素纳入决策。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多次阐述国际形势的整体趋向和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并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正式提出这一重要思想。这一论断建立在对全球战略高度概述的基础上,具有整体性、战略性和时代性特征。

邓小平的相关论述调整了这一时期对于国家安全的总体判断。他认为,虽然国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52 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 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7-258 页。

④ 《中国代表团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新安全观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02 年 8 月 1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xgxw_682524/200208/t20020801_9385519.shtml。

有限性与延展性：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

际形势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但是“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①“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②基于对战争可避免、可遏制的判断，中国将追求和平与谋求自身发展的目标相结合，有意识地“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最起码是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延缓的时间越长越好。这就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切措施和政策的出发点。”^③邓小平也主张在外交上采取谨慎态度，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从而能善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困难和挑战面前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④在国内领域，邓小平也从大环境稳定的全局视角切入，指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举足轻重。他强调，如果“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⑤“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⑥邓小平的安全思想准确把握了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全面、辩证地评估了战争与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及其相应影响。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各极力量此消彼长，世界权力格局发生重要变化。中国领导人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主动提出更为全面、综合的安全观，超越了以冷战思维为主导的西方传统安全观。江泽民认为，中国的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面临局部不确定因素的扰动和影响，需要全面审视，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世界新军事变革和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和此起彼伏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将会长远地影响世界安全形势。^⑦他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⑧

胡锦涛指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存在相互交织、共存发展的整体趋向。一方面，有对国家统一和主权构成严重威胁的民族分裂势力及活动，周边地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到一九九七》（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45-646 页。

④ 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田山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 年版，第 346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4 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4 页。

⑦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7-168 页。

⑧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36 页。

缘战略竞争,以及民族、宗教矛盾等传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能源安全、海外市场安全、生态环境等国家发展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① 尽管安全思想有所延展,但也存在要求聚焦、有所限度的有限性关切。胡锦涛认为各国需要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上,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贩毒、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在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等全局性问题的若干领域,还是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重点发展,重点突破。^② 事实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既有理念、路径与方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也逐步得到重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应运而生,其思想部分体现了安全有限的内容要求。

在安全认知层面,该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既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清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准确判断世界大势,^③ 又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在内的其他各方面的安全都纳入安全认知和工作之中,且重视程度日益增强。^④ 但在安全内涵扩展的情况下,安全认知的难度和要求也在提升,对于不同领域的安全风险未必能及时、快速反应,并予以相应重视。统筹和平衡各领域安全问题,为安全实践提供系统的思维指南,仍是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三) 方法论: 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为支撑

从邓小平开始,中国更为自觉地追求和塑造更为稳定、和平的国内外环境。在实现安全的方法层面,该时期弱化了斗争与革命的路径取向,将经济发展作为政治稳定的基石和手段,有限性体现为该阶段对发展方法的持续追求,而安全方法的多元发展和相互联系体现了延展性的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做的大事包括“加紧经济建设”,即“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⑤ 其中,经济建设的优先性比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等重要议程更高,是中国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⑥ 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①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5-37 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4 页。

③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6 页。

④ 和晓强:《建国以来“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特征分析》,《情报杂志》2020 年第 2 期。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0-241 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有限性与延展性：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① 这些重要论断锚定了该时期以发展为先的中心任务，也是安全有限性的表现。

进入 21 世纪，党和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两手并举、共同促进国家安全的思路更加清晰。面对国防建设事宜，江泽民指出，要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军队建设创造的有利条件，逐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把手中的军费管好用好。同时坚决果断地停止军队、武警部队的一切经商活动，“这既是一场重大的经济斗争，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② 他强调要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不断增强我国国防实力，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③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江泽民则强调了经济发展与物质技术基础、风险防范以及民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紧密联系，指出如果制度建设不健全，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④ 中国在外交领域重视发展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通过政治与经济的有机结合，改善和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胡锦涛指出，外交工作需要把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作为重要任务，积极加以运筹。他强调通过加强经济外交，增进国际合作，有助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⑤

政经结合的方式广泛地见诸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外交实践，为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不过，依靠发展并不能妥善解决一切问题，发展本身也可能面临或制造新的矛盾，有限性所带来的张力依然存在。在国内，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愈发突出；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波动、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技术依赖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同样构成挑战。这一时期存在的安全需求与实际挑战需要更为科学系统的安全方法，增加应对复杂事态的政策工具。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0-37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22、340 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0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17 页。

⑤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8-239 页。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2 年至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中国发展指出了新的历史方位。^① 这一重大政治判断主要基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反映出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

在新的历史方位中，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也呈现出新特点。一方面，中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中，国内环境与全球环境都在经历深刻、广泛且复杂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威胁和风险因素增多，战略机遇期、安全风险凸显期和全球安全塑造期交织重叠。^② 寻求一种系统、全面的国家安全思想，是应对中国安全环境新变化、满足国家安全和发​​展需求的必然要求。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既有对过往两个时期的继承，更有创造性的发展，在有限性与延展性之间实现了优化均衡。

(一) 本体论：国家安全思想的总体布局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共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④ 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鲜明的延展性特征。其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揭示了国家安全的整体性，与国家安全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 页。

②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9 页；李文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国际安全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52-54 页；中共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33 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0-31 页。

④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16 日，第 1 版。

有限性与延展性：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

有关的各方面形成了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① 国家安全所涵盖的领域，既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② 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大安全”理念，既有传统安全，又有非传统安全，既包括物的安全，又关心人的安全。

其二，总体国家安全观使得系统的安全理论成为可能，综合呈现了对安全主体、安全议题和安全逻辑的延续和完善。在安全主体方面，传统安全观以国家、政府为主体，而新时代的安全观则是多元行为体互动、多元领域交织的产物。在议题领域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兼顾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安全观以军事安全为核心，新的安全观则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的安全，不仅涵盖军事、政治安全，也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安全，其“总体”性超越表层的分类和聚类，且还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在安全逻辑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零和、负和的安全逻辑，蕴含着对安全相对性的理解和追求。在新的安全观框架下，无论全球安全态势的演进出现何种新挑战和所谓“脱钩”危机，在广泛的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社会和环境等诸多领域，安全问题都无法依靠简单粗暴的强力手段予以解决。主权国家应认识到安全是相对的，风险因素始终存在，没有绝对的安全。因此只有采取灵活、动态的管理方法，更加积极融入多边机制和国际社会，在参与、合作中让渡部分权力，并主动优化世界政治、国际治理、国内治理的规则，才能够实现普遍安全。

虽然总体国家安全思想丰富了国家安全的内容，但并非将安全泛化。其一，追求相对安全的安全目标得以延续和强调。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③ 该表述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国对有限安全目标的追求。其二，尽管重点安全领域有所拓展，但各领域、各议题间存在区分和协调。通过强调“一个总体”和“十个坚持”的核心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安全思想

①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②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施行），第二条。

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逻辑严密的体系。这种理念并不是无限制地扩展安全的概念，而是在确保涵盖关键领域的基础上，强调各领域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是安全思想有限性的体现。

因此在本体论层面，新时代的安全思想具备有限性和延展性。它随着时代发展和实践的需要不断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结合，是历史思维、世界视野和时代精神的融会贯通，更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高度统一。

（二）认识论：对安全领域的系统把握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① 其“总体”的要求不是各安全领域相关要素的罗列或叠加，而是系统、全面和辩证统一的“有限—延展”性体现。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领域联动、因素交织和行为体互动，新时代国家安全思想强调采用系统视角进行审视。^②

首先，以系统视角观察安全领域，就要认识到各领域安全风险的普遍性、联动性和多样性。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到 2016 年民粹主义浪潮与中美贸易争端的揭幕，从新冠肺炎疫情到俄乌冲突和巴以战火的再起，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层出不穷，安全问题早已跨越了地理范畴。“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③ 这就要求中国以开放、动态的全球思维去认知国内外安全环境，深化对安全风险的理解，参与维护和塑造国际安全，为中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对国家而言，安全风险的联动效应和相互作用需要更有力的应对。如果防范不及，各式各样的安全风险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8 页。

② 袁鹏：《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7 期，第 1-3 页；祁昊天：《国家安全系统理论刍议》，《国际政治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65 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35-136 页。

危及国家安全。”^①

其次，在对安全环境及其风险的系统性理解之外，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对安全理念、原则和实践行动也进行了系统性阐释。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在安全治理赤字、大国复杂竞合的动荡环境中，进行系统战略谋划和外交部署的重要成果。

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国家安全思想的有限性与延展性特征。全球安全倡议吸纳和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全理念精华。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② 这些理念聚焦国家主权、和平协商等安全关切，既有突出的理念指引和重要原则，又有理念间的相互呼应，辩证统一；既坚持主体间安全不可分割、安全风险复合体不可分割、全球安全社会不可分割的安全理念，用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作为理论支撑；又兼顾了多边主义安全治理的现实需要和国家间安全和发展需求平等互惠的价值关怀。^③ 既强调了安全主体的多元一体性，又体现了安全领域的多维多域性和维护安全手段的协同联动性，以及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④

最后，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相关思想、理论和政策指导的发展，在党的思想谱系上创造了多个突破。例如，首次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首次明确将安全列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等。这些思想层面的发展反映了党和政府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本质特征，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⑤ 这些思想发展的结晶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思想认知的进一步延展和完善。

（三）方法论：统筹安全目标与路径

在方法维度上，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积极追求多元安全目标的综合平衡，同时强化安全建设能力，主动塑造安全环境。这涉及对诸多安全目标的统筹：既统筹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29—130 页。

②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22 日，第 15 版。

③ 刘胜湘、唐探奇：《安全不可分割：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兼论全球安全倡议》，《国际安全研究》2023 年第 5 期；祁昊天：《从整合、多元到协商：安全共同体理念演化与全球安全治理》，《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④ 于铁军：《全球安全倡议：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呈现和延展》，《教学与研究》2024 年第 7 期，第 40 页。

⑤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系列谈》，《解放军报》2022 年 5 月 11 日，第 7 版。

发展和安全，特别是强调安全的战略地位；又统筹战略与策略，兼顾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第一，新时代国家安全思想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首先，强调安全的战略地位。作为对既往时期侧重发展方法的补充和优化，统筹发展和安全实际承认了安全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将安全作为发展的屏障。“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① 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有力保证。^②

其次，“统筹发展和安全”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科学认知、思考并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与战略布局。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有效统筹需要强化二者的能力建设和相互作用。通过统筹可以让两者在复杂态势和多元领域中相互作用，共同演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辩证法在安全时空中的实践展现，反映出安全的延展性特征。

最后，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妥善调配资源，把握各自任务的重点领域和核心议题，即尊重安全的有限性。在发展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需要大力推进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③ 在安全方面，新时代安全思想强调新兴战略能力的提升，要求系统把握新兴战略能力的建设重点，注重相应成本、策略，发挥最大战略优势，达成制衡效果。^④

第二，新时代安全思想重视对战略和策略的统筹，强调兼顾长期和短期目标。围绕战略与策略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而策略是战略实施的科学方法。^⑤ 为了实现安全目标，获得各领域斗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战略规划，还需要策略方法。将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高屋建瓴，扎实推进。^⑥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5、84 页。

② 人民日报评论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8 日，第 3 版。

③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 年第 11 期。

④ 仇昊、陈小迁：《对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认识与思考》，《解放军报》2024 年 3 月 19 日，第 7 版。

⑤ 人民日报评论部：《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人民观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22 日，第 5 版。

⑥ 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求是》2022 年第 13 期，第 13-14 页。

战略与策略问题实际也反映了安全方法的有限性与延展性特征。从历史的视角看，战略问题是国家和政党的根本性问题，是统筹中不可忽视的工作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一百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① 基于既往安全建设的重要经验，新时代国家安全思想一方面体现了安全思想的延展性，强调战略的整体全局，注重分析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战略策略的研究和把握，从战略视角思考、研究和筹谋涉及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出安全有限性的要求，把握战略重点，强调战略定力。要求“牵住牛鼻子”，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追求落一子而全盘活的改革；“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防止避重就轻、避难就易、避实就虚。”^② 同时，增强战略的稳定性，用战略定力抵御风险挑战，强调战略一经形成，就要长期坚持、一抓到底、善作善成，不要随意改变。^③

通过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战略和策略，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方法论突出路径手段的丰富以及统筹作为统领性方法的地位。安全手段则从运用政治、军事力量转向全面运用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综合力量，配合多元化的安全和发展目标，从单一维度的维护国家安全转向主动塑造国家安全，实现了安全方法的全面升级和优化。

六 总结

总体观之，从新中国建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安全的理念与实践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思想维度中不断演进，在三论之间形成了有限与延展的特征，逐步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生存性威胁与安全风险、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有机地融合到整体国家安全战略中。^④

① 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求是》2022年第13期，第11页。

② 《习近平2013年12月27日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的讲话》，载刘志辉主编：《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军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

③ 人民日报评论部：《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人民观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2023年2月22日，第5版。

④ 宋德星：《重新理解国家安全：三重认知逻辑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5期，第8页。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从安全全局出发，将确保新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独立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需求，安全内容主要集中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同时，由于基础薄弱，资源有限，安全思想非常强调资源调配与行动效率，避免过度消耗；但也存在对建设社会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与实践的局限。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安全内容从单一的政治和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多领域。经济改革带来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新的安全需求，如金融风险、社会矛盾、环境保护和科技竞争等。这些新的安全需求反映了国家安全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开始更加强调综合应对，资源和手段的运用更加多元化和精准化，但由于安全内容的扩展，资源的相对有限性仍较为突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安全问题的覆盖面更加广泛，安全思想更加强调整体统筹和协同应对，安全方法要求综合运用各类资源和手段，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并需要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的保障。同时，新时代的安全思想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出发，强调没有绝对的安全，通过理念层面的全球安全观和实践层面对全球安全共同体的追求，强调相对且更可持续的安全；把握安全重点，做好综合应对。

在七十多年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国家安全思想更加“收”“放”合宜。面对时代特征和安全环境的变迁，几代中国领导集体运筹帷幄，殚精竭虑，实现了对安全思想及其实践的灵活调整与发展优化。“有限—延展”的安全思想在明确国家安全重要领域、强调传统安全关切的同时，也拥抱了安全领域和安全方法的丰富和发展，强调对目标追求的动态均衡，尊重安全资源和手段的相对有限，持续寻求科学、全面、可持续的安全认知与安全方案。本文通过历史梳理和“有限—延展”特征的分析框架，突出了新中国安全思想与实践强调安全延展、尊重安全有限的连贯主线，这既是党和人民在追求与维护安全的征程中智慧、担当与勇气的生动体现，也是应对未来安全威胁和复杂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助力。

【来稿日期：2024-09-22】

【修回日期：2024-10-21】

【责任编辑：谢 磊】

stability functions. After undergoing the sequential process from dissociation to inp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new element, starts to interact with the political security syste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security follows the logical process of “technology-application-risk-system” and exerts impact on other elements within the system. This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impact has enabl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xtensively embed itself into the political security system and reconstruct the political security structure. Therefore, political security is facing more complex risk forms brought abou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nal ecology of political security, including power security, institutional security and value security, will accordingly undergo profound changes and facilitate a deep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tire form of political securit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tical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s science

[Authors] FENG Shuai, Associate Researcher and Secretary-General, the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XUE Shikun, M.A. Student,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200233).

73 **Finiteness and Extensibility: The Evolution of the PRC’s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s**

QI Haotian and ZHAO Shuyu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ontology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ecurity practices. The discuss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PRC: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era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niteness and extensibility are identified as coherent them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RC’s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s that embody static and dynamic features as well a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of security goals, perceptions, and methods at each stage. Despite the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s and evolving security needs the PRC has encountered, the principles of finite security and extensible adaptation have consistently guided its security thoughts and practices. Security cannot be overloaded, even though it is resilient. There is no room for absolute security, and a narrowly defined, single-dimensional approach is insufficien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particularly in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un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finite-extensible” evolution of the PRC’s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s captu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bjective change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s of national leader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Keywords]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s, evolution, finiteness, extensibility

[Authors] QI Haoti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ZHAO Shuyu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